

在大阳部体放分单

教授幸福秘訣的老師

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

孫永年教授

林宏聰 採訪撰文

「我並不是很特殊,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交大畢業生,」就是因為這個理由,謙虚的孫永年學長推掉了記者好幾次約訪,但是翻開他的資歷,卻怎麼也不能用普通兩個字含糊帶過:美國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助理研究員、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兼所長、還曾經獲頌國科會傑出研究獎…等。借用他的話來說,他是「以隨遇而安的心態,一步一步踏實地扮演好每一個角色。」或許是這一股內斂的力量,讓他將平凡中的不平凡,詮釋的淋漓盡致。

盡己所能,隨遇而安的人生觀

孫永年出生在台南一個雙親都是老師的家庭,公務員的身份讓父母常常沒辦法回家做晚飯,他除了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,也要照顧比自己小一歲的弟弟,因此而培養出獨立自主的個性,這一點從零用錢的發放制度不難窺見。他說,「我媽媽挺有趣的,她一個學期只給我一次零用錢,把學費、生活費都先算好,在開學的時候一次給我,至於怎麼使用就全看我自己了。」於是孫永年必須規劃好自己的開支,留下學費以及一部份的生活費之後,其他的錢全部存到郵局,有需要的時候再提出來使用,把財務管理的有條不紊

孫教授認爲家庭環境給予他充分的自由,他笑著說,或許是父母在學校花很多時間和學生溝通,回到家之後反而不太會管自己的小孩。不過也因爲孫永年從小到大課業成績都不差,各項表現也一向穩當,因此無須父母操心。

孫永年的國中、高中時期都在台南度過,大學陰錯陽差的被分發到交大控工 系,「老實說,我最喜歡的是化學,雖然沒有補習,但是化學的成績一向不錯,



变大南部独立分會



孫永年學長 提供

大一的化學課還拿到將近一百分的高分。」即使孫永年最有興趣的科目是化學, 但他還是依照父母的期望,志願卡從台大電機系開始填起。他記得選填志願時, 交大的科系填得很少,但是最後按照成績仍然被分發到交大,他一直深信這就是 所謂的緣分。

談到大學四年的生活,孫教授覺得自己過得相當充實。由於家庭經濟狀況還算不錯,因此大學時期他完全沒有打工的經驗,對於時下大學生普遍打工的情形,孫永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,「如果你真的需要打工,那就去吧!但是事實上,有很多人是花一些時間打工,然後花更多的時間把錢用掉。」

他認為特別是在現在就學貸款低利的情況下,同學們或許可以考慮省下打工的時間,花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對孫永年來說,「均衡」是一個很重要的做事觀念,不論做什麼事情,他都會有一套完善的規劃,而且面面俱到,不會有任何偏廢。例如在大學時期,他就將時間平均分配在課業、社團活動和交友三個部



奎大南部橡皮分會

分,他認為這些都是大學必修的重要學分。

他透露當時交大學生人數很少,全校大約只有一千六百多人,女生人數更只有三十七人,所以學校的男生要交女朋友大多是「向外發展」,他也不例外。因爲女朋友就讀台大國貿系,所以他常常坐車到台北,他笑著說,「因爲學校女同學少,所以我們到校外交女朋友可是義無反顧、勇往直前呢!」

此外,他也踴躍參加各項活動。說起參加拔河隊的往事,孫永年眼中露出興奮的光芒,口氣裡盡是得意,他說當年梅竹賽的時候,交大可是連四年冠軍,「怎麼樣?夠輝煌了吧?!」

回憶起在交大的日子,他認為交大是一個很純樸的學校,同學們雖然課外活動很多,但是多半不會偏廢課業,所以即使平時大家都會參加登山、健行、舞會、看電影等活動,但是同學們的成績都還是維持得不錯。孫永年覺得雖然控工系一直不是學校的大系,但是老師跟同學之間的感情很好,也就是這一股親密的凝聚力,讓交大的畢業生在各行各業都能互相扶持,表現出亮眼的成績。

他認為外界雖然普遍認為交大是理工學校,但畢業學長們在人文方面的表現 其實也不惶多讓,只不過這些人文素養可能來自於他們後來的自我體驗。他說, 「交大的特色是工程,但極限也是工程,如果能夠加上人文素養的訓練,那麼我們 才是真正最好的工程。」雖然孫永年一路接受理工學科的訓練,但是他說,「理 工領域的知識很固定,不過卻沒辦法填充整個人生。」他很愛看書,各個領域的 書都看。

其實在交大的時候,孫永年就立定志向「要做一個在產業界闖出一番天地的人」。所以他積極選修或旁聽管理科學系的課程,經濟、會計、管理學的課堂上,通常都會看到他的身影。大學畢業之後,他也曾經報考管研所,但是當時學術界風氣較保守,門戶的觀念仍然很深,不屬於任何管理科系的孫永年,在這場競爭之中吃了虧,最後只好入伍當兵。

服完兵役後,孫永年隨即進入台塑仁武廠擔任控制工程師,當時的女朋友(就是後來的老婆)也在台南的台灣銀行做事,本來兩人的經濟能力已經足以共組小家庭,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,但是由於孫永年的許多親戚都曾經出國留學,也間接影響了他的母親。因此在家人的慫恿下,孫永年向匹茲堡大學遞出申請,也順利被接受,於是他結束在台塑短短一年的工作生涯,隻身前往美國求學,從此與產業界的距離愈來愈遠,他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。



談到這裡,令人好奇的是從孫教授身上散發出來的兩種看似極端的處世態度,也就是「積極規劃」與「隨遇而安」。其實從孫永年大學時期的抱負和規劃看來,他是很明確地朝向產業界發展,也以一種極爲豪邁的口氣宣告著:「我要在產業界闖出一番天地。」然而在說到研究所考試失利、離開台塑到美國唸書等規劃之外的發展時,在他臉上卻看不出絲毫落寞或可惜,與大學時期的霸氣相較之下,卻是多了一份對人生無常的領悟,問他如何調適這樣的落差,他先是想了一下,然後語重心長地解釋說:

「年輕的時候理想性比較高,覺得人定勝天,總認爲自己一定能走出一條路,就算篳路藍縷最後也一定會變成康莊大道。可是人生真的能夠這樣嗎?其實做人不要去看成果,因爲一定有別人比你好,只用成果來評斷並不是完全正確的。

年輕的時候總覺得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去弄清楚,要有絕對的成功或失敗,不是零就是一,交大尤其如此,理工領域不就是零和一組成的嗎?但其實人生是fuzzy的,而且人生的成績由別人來打,一點意義都沒有,一定要自己來打分數。別人給的成績即使很客觀,但其實沒有意義,因爲人生是自己在過的。」孫永年認爲規劃還是很重要,但是他強調「規劃了就去做啊,但是千萬不要太計較最後的成果。」在他身上,讓人看到了一種「盡己所能,隨遇而安」的巧妙平衡。

壓力是進步的原動力

到匹茲堡大學攻讀碩上和博士學位,是孫永年轉戰學術界的一個分水嶺。他到了美國之後,發現同班的幾個台灣同學之中,就屬他完全沒有研究經驗,他評估自己在申請 TA(教學助理)、RA(研究助理)時會比別人困難,因此破釜沈舟、發憤圖強地唸書,一學期過後,他終於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教學助理的獎學金。孫永年自豪的說,「算一算我也才繳了第一學期一千多美金的學費,之後的學費全免,學校還每個月給690美元的獎學金。」

比起在台灣讀研究所,孫永年覺得國外留學的環境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壓力。 他說在國內讀書的學生有太多選擇,「可以選擇先去賺錢,或者先去當兵,甚至 是換個研究所來讀!」但是國外的學生沒有那麼多選擇的機會,出國留學就是一 心想趕快畢業,只有在經濟壓力、修業年限的壓力下,國外的留學生才能真正體 會「破釜沈舟」的意義。

孫永年待在美國的時間長達六年,枯燥的留學生活也有幸福的插曲,碩士班



全大南部链双分會

讀了一年之後,在台灣的女朋友也決定放棄國內的工作,到美國唸書,也因此經 過愛情長跑的兩人終於結婚。

在美國修碩士學位期間,他培養了對學術研究的興趣。他認為「如果沒有興趣去做一件事,那是很大的負擔,但是其實每一件事都是很有趣的,如果你有心把它做好,那麼任何難題就開始變得好玩了。」於是他想,反正都已經走了技術的路,那麼就乾脆走到底,之後再來考慮要往學術界還是工業界發展,因此他決定繼續留在匹茲堡大學,攻讀博士學位。

博士班讀了三年,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,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,但是在美國重視老師權威的學術環境中,指導老師金口沒開,任誰也畢不了業,孫永年雖然急著想畢業,但是也只能在心裡暗自著急。後來還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,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主動到學校挖角,邀請孫永年擔任助理研究員,他才因此獲得指導老師首肯,離開匹茲堡大學,開始在布魯克海芬實驗室的工作生涯。

回憶起當時急著畢業的心情,孫永年半開玩笑地說,在讀博士班的時候,大 女兒已經出生,有一天他突然發現如果自己再不畢業,不就要等著跟女兒一起去 上學了嗎?

就是在這樣的另類壓力之下,他才會急著趕快拿到博士學位。

住在果嶺上的日子

雖然在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的工作只有短短一年,但卻是讓孫永年相當懷念的時光。

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位於長島,座落在紐約市的東邊,是一個美麗的半島。回憶起那段日子,孫永年的臉上不自覺地露出懷念的神情,他說布魯克海芬實驗室就像一所很大的大學,唯一的差別就是不需要教書,「而且場地很大,冬天的時候還會有鹿群在園區裡奔跑。」更令人嚮往的是他的住家,「房子就在高爾夫球場的中間,每天早上一打開窗子,外面就是綠油油的一片。如果你想要推幾桿,出了門大約走一百步就是果嶺,」悠閒愜意的生活讓孫永年打算從此定居美國。

可是,在長島的日子也沒有持續很久,一年之後,因爲父母表示希望他回到 家鄉,孝順的他於是放棄助理研究員的工作,1989年回到台南,在成大資訊工程 系任教。對於十多年在成大的教學,孫永年自認爲沒有什麼特別,「該做的就



自企成数略酮大变

做,該升等的時候就去升等。」就在一切隨緣的心態下,他一路從副教授、教授、然後升任資訊工程系的系主任兼所長,一直到西元1999年卸下系主任的重擔,目前在成大擔任特聘教授。

知識很重要,幸福更重要

「我以前可是一個很兇的老師呢!」說完之後,孫永年還是忍不住爆出一陣爽朗的笑聲,實在看不出來眼前這位戴著眼鏡,身材魁梧,待人非常客氣的長者,竟然會是個嚴苛的老師。孫永年透露,「我年輕的時候在學術上要求的非常嚴,常常在學校待到晚上十一、二點才回家,隔天早上七點多就來學校,那些研究生還來不及把臉洗乾淨我就出現了,他們還常常睡實驗室啊!」

但是隨著年齡增長,生活歷練讓邁入天命之年的孫永年,在與研究生相處時,更多了一份體諒與關懷。他說,「其實現在來看這些研究生,有些也比我的孩子大不了幾歲。」所以他除了傳道授業之外,同時也表現出慈父的責任感,希望能教給學生一套終生受用的處世態度。他表示,「今天我教你程式怎麼寫,還不如教你人生的路應該怎麼走。」因此孫教授與學生之間的話題,不侷限在課業範圍,舉凡生活、感情、家庭等問題,他都非常樂意與學生討論。

每個星期六是他和研究生固定 meeting 的日子,因為他一直覺得週休二日太多了。他補充說,「休息當然很重要,但是一般人週休二日通常就是去看電影、找朋友玩、或是參加派對狂歡,可是把時間金錢花費掉之後,並沒有得到什麼,只不過是星期一回到工作崗位比較累而已。」他還是覺得凡事都要求平衡、都要有限度,娛樂也是如此,「我們都以爲沒事就是幸福,真的是這樣嗎?」

孫永年對「幸福」的定義很簡單,他說「幸福就是瞭解自己的位置」,也就 是瞭解自己所處的環境,明確訂出對自己的期許,然後一步一步的去達成。看似 容易的三言兩語,卻是孫永年最想要教給學生的處世態度,也是他最想解答的人 生大哉問。

教了十幾年的書,孫教授覺得教學主要的成就有兩種:第一就是將程度差、表現差的學生教好,讓他們不至於成爲社會的負擔;另一種成就就是遇到程度好的學生,好好啓發他們,讓他們「青出於藍,更甚於藍。」要孫教授爲自己的教學成果打個分數,他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,只是笑笑的說,「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」言下之意,孫永年不僅對學生充滿期待,也對未來的教學工作滿懷壯志;除了傳授知識,他更希望傳授幸福!